

Sri

■学人素描

从最优税率到测量收入不平等

阿特金森：把社会价值引入对分配的度量

◎史晨昱

进入21世纪后,公共经济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专门研究公共经济问题的公共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最具活力、最引人入胜的领域之一。其中,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对推动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

早在1981年,阿特金森与斯蒂格里茨合著出版了影响深远之作《公共经济学》,预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首先,将分析重点和重心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公共经济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其次,发展了理论研究的综合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其他学科向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公共经济问题和解释公共经济现象;再次,从效率和分配两个角度同时考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

现任牛津大学拉菲尔德学院院长阿特金森教授,1944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的蒙默思卡尔斯莱昂,1966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1969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至1971年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任研究员,1971年至1976年任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1976—1979年任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980—1992年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1992—1994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特金森1988年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9年至1992年任国际经济学会联合会会长,1989年担任欧洲经济学会联合会会长。阿特金森的学术成果颇丰,他在前人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以专题的形式集中探讨当时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或有价值的问题,且多有创见。

最优税理论

在福利经济学中,“最优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市场配置效率原则”。19世纪末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埃奇沃思、帕累托等的研究成果认为,市场自身足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就能使商品供求达到均衡。此时,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在存在公共品、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率的,这就需要政府干预。福利经济学家把“最优原则”推广到公共部门,要求公共部门行使配置职能时,或者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或者提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如公共品),或者矫正因市场失灵所致的某些损失。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家把该原则应用于税制建设中。

阿特金森等经济学家认为,应



在维持一定的政府税收收入前提下,使课税行为导致的效率损失达到最小,从而建立了“最优税理论”。最优税理论主要是指税收制度的设置必须满足一定税收原则的要求,这些原则包括效率、公平、经济稳定与增长、管理等等。而一套能够实现这些原则目标的税制,能在提供政府所需财政收入的同时,又能较好地激励经济行为主体。最优税理论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直接税(所得税)与间接税(商品税)的合理搭配;二是寻找一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最优商品税;三是假定收入体系是以所得税而非商品课税为基础的,如何确定最优累进(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实现公平又兼顾效率。阿特金森指出,最优税理论综合考虑了商品税和所得税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避免了孤立看问题带来的缺陷。商品课税容易实现效率目标,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具有公平分配收入的功能;所得税容易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促进经济效率。

在研究了商品税和所得税的适当组合,特别是用差别商品税来补充所得税是否可取的问题之后,阿特金森得出结论:在同时征收间接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开放税收体系下,如果政府更为关注收入分配,一般则会使用间接税,但由于均一间接税等价于同比例所得税,因此以不同税率运用间接税成为最关键的选项。

一般说来,在关注收入分配的平等并无所得税的条件下,最优税

率随商品需求弹性的上升而提高,然而在引进具有免税水平的所得税以后,就没有必要使用间接税,而单纯通过一个固定边际税率率的线性所得税就可以简单地达到最优目的。如果政府没有分配目标而仅仅关注效率,那就可仅仅使用直接税,并采用人头税的方式来完成。线性所得税只是所得税的特殊形式,更一般的所得税类型是非线性累进所得税。当所得税边际税率有多个,且税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最高的边际税率定为100%,这样的累进所得税制度称之为非线性所得税。非线性所得税明显提供了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所得税的分配目标。阿特金森以为,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间接税是最优的,只要劳动和所有消费的商品之间是弱可分的效用函数。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

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用阿特金森的话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收入分配更令人感兴趣,但也沒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像收入分配一样那么缺少科学研究”。

很显然,收入分配过于均衡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或者研究一个给定国家的分配的变化,一些衡量不同福利或者收入的指数是必需的。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们关注实际的收入分配等级的产生,稍后开始考虑如何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基尼在1913年提出了至今被广泛使用的基尼系数概念。从那以后经济学家们便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运用统计学中的分布理论假说来描述观察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这种用方差、方差系数、相关平均离差、对数标准差等统计量(值)来概括分配分散程度的方法,称为实证方法。

阿特金森认为,讨论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的,以实证方法度量不平等,从表面上看似避免了福利分析,但对这些方法更详细的考察将表明,每种方法都是以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隐含假设为基础的。如果能使这些隐含的社会福利函数明确化,我们就将更加清楚地看到每种度量隐含的公平观。比如,基尼系数所体现的社会福利水平是以收入的加权平均来衡量的,其权重就是将收入排序得到的序数,更具体地说,它给予最高收入者的序数是1,第一高收入者的序数是2,依此类推。显然,基尼系数给出的社会福利评价是一个隐含的任意社会福利函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统计度量方法遭到批判

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对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价值判断引入度量之中,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利用社会福利函数,从具体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推导出不平等度量尺度而使福利判断显性化。

社会福利函数能依据社会偏好为各种社会状态排序。这里状态可以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也可以是收入、财富的分配。阿特金森在借鉴和考察他人关于不平等分配计量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为切合实际的计量方法,即规范法。规范方法就是以平等主义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从而导出不平等的度量的。度量指标直接显示了价值判断,而不是如实证方法那样只是对实际的分配模式作统计描述。

在考察了传统不平等计量方法存在的缺陷后,阿特金森通过引入公平分配的均衡收入水平的概念,重新确定了不平等计量的公式(阿特金森指数),即 $I=1-I'$ 。I在0-1之间变动。当I值下降时,意味着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如果某国的I值为0.3,就意味着要实现收入的平等分配,只需要使现有国民收入的70%达到相同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说一个使均衡金额增加5%的再分配方案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了进一步反映人们对绝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阿特金森稍后又改造和发展了上述公式。阿特金森指数不仅

对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转移更加敏感,而且与不平等厌恶程度的相关性较强,因此,它比惯常的测度不平等的方法在逻辑上更加严密,更能准确测度不平等程度。

阿特金森还专门研究了就收入分配以及财富的跨代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状况不仅决定于个人不同的禀赋、嗜好和运气等自身因素,而且还要受税制、公共支出等利益分配、社会政策的动态变化和财富跨代分配的程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阿特金森认为,在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决定于个人的收益能力,但收益能力在各代之间的传递要受诸如婚姻形式等诸多社会变量的影响,从而造成各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即使个人收益能力相同,但由于受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同代人之间或跨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也会不尽平等;其次,个人财富分配状况还要受制于继承财产的程度,而继承财产的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取决于支配财产分配的各种继承法规及其与家庭规模的相互作用。因此,各种继承法规与家庭规模成为影响财富跨代分配状况的重要因素。此外,具有不同能力和嗜好的人还要受经常变化的诸如鼓励或管制投机、鼓励或控制土地的使用等经济政策(可通过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实施)的影响,从而不断改变着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本期人物话语



四大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在出席“2007年中国(天津)供应链管理论坛”时提出,有四大因素支撑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是改革效应;二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三是教育和技术;四是城市化的开展。所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了10%的高增长,这种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并不会“突然放缓”。

■多声道

外贸调控目标不是“减存量”是“压增幅”

王子先(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6月1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对顺差的调控目标应该不是“减存量”,而是“压增幅”,在降低顺差增幅方面,我们要积极采取政策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我们提出了8项扩大进口的措施:第一,抓紧研究制定我国进口战略;第二,进一步开放市场;第三,扩大服务进口,促进产业升级,没有必要追求逆差为顺差;第四,加大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扩大技术进口;第五,增加进口重要战略物资;第六,对贸易不平衡重点国家有规律地开展政府采购;第七,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第八,开展大宗设备的国际租赁。

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有贸易逆差

拉米(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13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客观看待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数字上看,中国对欧美贸易顺差确实很大,但中国很大一部分出口实质上是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将其产品的最后一个环节安排在中国完成。因此,不能只看到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还应看到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在看到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目前中国每年的出口和进口增幅均超过了20%。

单位能耗下降20%目标实现有难度

戴彦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6月12日在国家发改委节能信息传播中心举办的“公众节能指南”发布会上说,以中国现有的政策、政策力度及政策框架,不足以应对当前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及挑战,实现“单位GDP能耗要下降20%”的节能目标有难度。国家已经或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淘汰、关闭落后生产能力,以大代小、技术改造,出台财税价格政策,以及干部目标责任考核等,如果这些节能措施能一一落实到位,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也并非不可能。

猪肉涨价主因是供给不足

贾幼陵(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在11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我国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猪肉供给不足。引起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生猪价格达到低谷,饲料价格大幅上涨,两者相叠加造成母猪存栏数一定程度的下降。生猪的病死率与市场价格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去年我国生猪价格一路下跌,与此同时饲料价格却在快速上升。在此情况下,养猪无利可图,于是今年母猪存栏数下降。至于从去年夏秋开始发生的猪蓝耳病,并不是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美加观潮

在加拿大做房东

◎徐程

在加拿大找工作很难,找好工作更难。于是一部分新移民以及有一定积累的老移民买房出租变成了热门的投资。从1999年开始,加拿大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启动升值,短短五六年达到顶峰。在那时买房的人备受市场的恩惠,获利从30%到200%不等。尤其在市区的独立House涨势最猛,什么破房老房都要价都在50万加币以上。市中心的Condo(相当于中国的酒店式公寓)也涨势喜人。

央街是多伦多最大的一条街,以此分东西,西部繁华,东部冷落。西部是商业区、富人区,东部是厂区、贫民区。但斯家堡在多伦多东部却繁华异常,中国有位领导人曾访问过那儿的唐人街,说这是他所看到的全世界最好最大的华人社区。

在斯家堡你不需要懂英文,因为到处是中文招牌。我有几个朋友在斯家堡置了房产,自己住一小间,然后开许多门,将其余的房间租出去。不仅可以以房养房,还可以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但去年房地产的涨势结束了,于是在《星岛日报》整版整版刊出租房广告。仿佛一夜之间房地产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了。许多朋友叫苦不迭。

我有个同学原先他的房客都是华人,而今在找不到华人租房客的情况下,找了个西人。在这个区域找房

的西人,一般经济状况总不太好。那西人是40岁左右的单身汉。自他搬进来就不太平了。首先不断有女人来,喝酒胡闹,然后就是音乐整天不断,而且开得很响。有一次一个华人房客受不了报了警。警察进来把他训了一顿,从此晚上不敢开响了。最要命的是拖欠房租,他有钱整箱整箱地买啤酒,(加拿大啤酒奇贵)就是到时不付租金。

我朋友的语言程度不够跟他争论。于是叫我去和他谈。周末我赶到那儿,轻轻地敲开他的门说明来意,他露出脸说失业了,政府有法律条文保护房客的。他说了一串条文名字和条款号码,叫我去查。我问了一下懂法律的朋友,他们说麻烦了,特别在天冷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把房客赶大街的。甚至你卖房时,也不能把已有的房客赶走。有些房子卖价出奇的便宜,那说不定就是房客太刁的原因造成的。我回上海时听说那人找到工作了,于是开始交房租。但其他的房客都纷纷搬走了。说这白人“很烂”。

前几年斯家堡发生了起惊动世界的事件。一个非常可爱的华人小女孩失踪了,一年后才找到她的遗骨。去年案犯落网,还是个上海人,是曾在小女孩家住过的房客。这家男主人痛不欲生。其实他有份很好的IT工作,不知为什么非要把一栋房子分租五六家,去赚这个钱呢?所以,任何种族的人都有两面性。

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的房价升到最高,因为那儿产油。这个省富得流油。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但你去一马路上会被房价吓倒,所以人们还是裹足不前。只有政府出手建造大量廉价公寓才能吸引人们前去工作。但是,加拿大的石油成本很高,只有在油价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才能开采。假如世界经济放缓,油价回落,油田关闭,那么这些公寓就成了鬼屋。这也是瞬息之间会发生的事。所以政府不出手也是有道理的。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朱伯康 留在人间的两个形象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朱伯康教授去世已近两年了。最近偶尔听说他晚年编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得了奖,不由得怀念起这位老人。

2005年7月,朱伯康终于没能迎来复旦百年校庆,悄悄地走了,享年98岁。他是定鼎革之后复旦大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也是见证十九路军浴血抗战的最后一位高级军官。但离世时,似乎什么都没有惊动。

在我们印象当中,似乎有两个朱伯康。一个是编纂《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的朱伯康,是奋勇杀敌、指挥若定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写作《经济学纲要》的朱伯康,是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大家。一武一文,相距甚远。可是这些书都有共同点,文字质朴,材料详实而且且少修饰。从两本截然不同的书的背后,我们都能读出作者的一片始终不变的爱国之心。

根据朱伯康自己的回忆,他中学毕业后考上南京军事工作研究养成所,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分配到蔡廷锴将军的第10师,隶属于陈铭枢的第11军,指导员则是后来十九路军的高级参谋华振中。可是朱伯康参军没多久就做了逃兵。因为他不愿意跟张发奎打仗送命。他回上海考上了劳动大学。正是在劳动大学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陶希圣教授。

陶希圣是北大早期毕业生,后来成为治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大家。当时也还年轻,为生活所迫,常在很多大学里兼课赚钱。30年代以后,陶希圣应邀去北大教书,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去就是很多年,特别是陶希圣后来创办了《食货》杂志,给老师和学生们提供平台,从中先后涌现出全汉升、何兹全、杨联升、周一良等一大批青年才俊,日后都卓然成家。而朱伯康正是陶希圣最早发现的杰出学生之一。陶希圣北上时就带着刚毕业的朱伯康。

可是,仅仅20出头的朱伯康哪里耐得住寂寞。他在《信报》上写一首诗讽刺蒋介石,“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人,昨夜将军大败还。”就是因为这首诗,朱伯康又把自己逼入困境,受到特务干扰而无法在北京呆下去。终于他下定决心,放弃学业,重新投奔十九路军。他一到军队随即被任命为少校参谋。这时淞沪抗战开始了,朱伯康迎来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淞沪血战期间,朱伯康与华振中一起收集编写关于抗战的《史料》。写作地点从上海南翔十九路军总部到八仙桥青年会,再辗转苏州顾家花园及至厦门漳州,非常艰苦。两人耗费半年多心血,终于撰成10余万言700多页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于1932年9月出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都纷纷为此作序。

可是淞沪抗战终究失败了。随后十九路军发动过一次著名的“闽变”,旋即失败,番号也被撤销。蔡廷锴当即就决定送手下一批高级军官出国留学,并资助费用,保留火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王亚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的。朱伯康手头不宽裕,但在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力资助下,终于凑起旅费,1934年远赴德国留学。他选择了经济学和财政学,因为这些学问是当时动乱的中国所最亟需的。不过短知短数,他就顺利取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夏,抗战全面爆发,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时年仅30岁。

从此以后,朱伯康走上另一条道路。他陆续在许多高校讲授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与复旦大学。他把多年来的主要讲稿整理成一册《经济学纲要》,1946年12月,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此书与市面上流行的刘秉麟、赵兰坪等的经济学教科书颇有些不同。朱伯康本来就推崇陶希圣的治学路径,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制度嵌入社会后的互动关系。留德以后,朱伯康更是努力借鉴德国经济学家李士特(今译李斯特)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整个经济。这样,朱伯康的这本教科书就在传统新古典边际分析之外,多了一重历史厚度。朱伯康坚持,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绝不能被逻辑所取代。

一直到1949年,朱伯康的这本书一直是市面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上世纪80年代影印《民国丛书》的时候,这本书当仁不让地入选,可以从中看到后人的评价。

出版《经济学纲要》以后,朱伯康的研究兴趣更决然地转向了经济史,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朱先生出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后,教学行政事务极为繁重,但是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他一直在准备一本经济史著作。直到1995年,在施正康教授的帮助下,他终于完成了那本《中国经济通史》。前后算起来,此书的准备工作长达半个世纪,真正是厚积薄发了。而且,朱伯康在这本书里的叙述平易近人,并不喜欢引经据典,又不作惊人语,只是娓娓道来。全书看似平淡却字字沉稳,证据充分,这正是治史高境界。